

畫壇怪傑張大千（上）

王成聖

求精求新不斷創造

張大千名爰，字季爰，別號大千居士，四川內江人，清光緒二十五年（民國紀元前十三年），夏曆己亥四月初一日（西元一八九九年五月十日）生，民國七十二年（一九八三）三月八日病逝臺北。他成名於民國廿五年以後，可說是橫跨新舊兩個時代的風雲人物。他以「竹杖芒鞋輕勝馬」的行裝，走遍全球五大洲，歷經六十年；他沒有所謂現代與傳統、中國與西方的困擾，對中國的傳統具有堅強的信心；他以為中國的藝術乃是天下第一，可是，他並不是固步自封，他不斷的從自己的藝術上求精求新，不斷的有創造。

他的思想、爲人，乃至生活、情調、喜愛，完全合乎中華文化，他畢生以身爲中國人爲光榮。

他年輕的時候，住在中国最著名的庭園「網師園」，盛年住在北平「頤和園」，流居海外時，住過印度大吉嶺、巴西的「八德園」、美國的「環翠庵」；返國後住外雙溪的「摩耶精舍」。這些地方，都有山水園林之勝。他自己經營的園

林，總是有各種盆栽，養各種珍禽異獸；還有手藝高明的廚師，讓他品嚐天下美食。

他到處受人敬仰、羨慕，也到處有良朋好友關心他，他過的生活，比王公巨富還要多一份瀟灑；真是當世少有的福人！他有獨特的形象和風骨，他的飄飄欲仙，寬袍大袖，實是胸羅萬有的表徵。從他的生命歷程裡，特別能顯現出生命的輝煌多姿和生活的美滿多采。

黑猿轉世大千和尚

張大千出生於四川內江，排行老八。據說他的母親曾太夫人將要臨盆的時候，夢見一個長者，送他一面盛有黑猿的大銅鑼，吩咐小心照顧黑猿；並說忌葷腥怕月亮。奇怪的是自他斷奶以後，沾到葷腥會翻胃嘔吐；看到月亮，就放聲大哭。

據薛慧山記述，有一天在長沙會陪張大千在澡堂入浴，彼此赤裸袒腹相對，看見他渾身上下，都生滿一片茸茸的黑毛；當薛慧山上前扶他之時，不料他那長長的肩膀，卻力大無窮，輕輕一摔，幾乎將薛慧山摔了一交。他喜歡猿猴也是事實，來臺後在「摩耶精舍」還養有幾隻。

因此，有關他是「黑猿投胎」的傳說，真有點玄妙。

當他十七歲那年在重慶求精中學讀書之時，有一次放暑假，在名叫「郵亭舖」的地方，被土匪綁票。土匪頭看他一表人才，居然逼他當師爺。一百天以後，才恢復自由。

十九歲，他和他二哥張善子同赴日本京都學習染織藝術，僱用一位翻譯幫助他。因爲有一日人說：「亡國奴的舌頭是軟的，要侍候人當然得學好話。」使一向民族自尊心特別強的他，受很大刺激，於是特地僱用一個日本人做僕人，侍候他。廿一歲，他回國，正式拜師學畫，首先在上海拜衡陽名士曾熙（農髯）爲師，曾農髯因他有「黑猿轉世」的傳說，特地爲他取名爲媛（即今寫之猿），號季爰。

不久，他因未婚妻謝舜華病逝，悲愴之餘，不顧全家信奉天主教的禁忌，跑到松江禪定寺去當和尚，法號「大千」。他當了一百天和尚，因爲不願在頭上燒戒巴，和當時佛門中聲望最高的諦闍老法師有所辯論，結果在舉行剃度大典的前夕，脫出佛門，重返初服，遵奉母命，回到家鄉

，與曾慶蓉結婚。

婚後回到上海，由曾熙介紹，再拜清道人李

瑞清爲師，學書法。曾、李兩位學人，都鼓勵他多訪名山大川，體認自然景觀，增啓靈感。至於他的繪畫，與他家庭有關。他母親擅長丹書，他二哥善子以畫虎著名；他九歲就從母親學畫，十二歲就以能畫山水人物花卉，有神童的雅號。自從他日侍曾熙、李瑞清二人左右（當時曾、李二人爲最負盛名的書畫鑑賞家），時常與各名家前輩觀摩接席，於是學問與藝術日進千里了。

民國十四年，他在上海寧波同鄉會舉行第一次個人畫展，展出一百幅，每幅定價廿元，結果全部賣出，奠定他走向職業畫家的基礎。

他在青年、壯年時期，除了繪畫外，還開始不惜重資的收藏古畫名蹟，曾以豐富的收藏，集印成「大風堂藏畫」四冊；另一方面，則熱愛自然，往往從搜奇峯、觀山勢中融會貫通，作爲他繪畫佈局的借鏡。

民國廿年，他赴日本爲唐宋元明中國畫展代表，廿五年任中央大學教授。

民國廿六年夏，他在北平度假；抗戰爆發，他因享名中外而被日軍軟禁。次年始得脫險，同到四川，寄寓青城山上清宮。

當時國難方殷，他自己身爲畫家，未能奮身疆場爲憾；乃思我國敦煌藝術，久已震驚世界，而國人尙無人前往實地訪察，如果他能前去加以研究，未嘗不是畫家報國之道。於是，自民國卅年起，他排除萬難兩度前往敦煌，前後工作三年之久。

敦煌臨畫力任艱鉅

敦煌之所以在藝術上有價值，是因爲那裡有千佛洞，有很多壁畫，這些壁畫大多出自中原名畫師之手，能够從而確定各時代的風格，考訂六朝、隋唐的衣冠制度，以補史書闕文之不足，還可以從臨摹各時代的代表作品中，使世人瞭解早於歐洲文藝復興以前約一千年東方繪畫，以及近一千年間的演進史。

爲了形容壁畫之美，他曾風趣的說：「人物到了盛唐，可以說已到達了至精至美的境界。有不少女體菩薩，雖然明知是壁畫，但是仍然可以使你怦然心動。」

敦煌地方缺水，生活條件很差，他必須多帶些人和應用東西去，所以他第一次出關前往敦煌，交由歐亞公司載運的行李，就有五百斤重。千佛洞在他未去之前，有個法國人伯希和曾經編過號，但是凌亂而無秩序。因爲法國人祇爲了攝影，認爲重要的就編，不重要就放棄，有時發現已經放棄的還有拍攝的必要，又回頭接着編，諸如此類，毫無系統。

因此，他第一次去敦煌的全部工作，就是重新編號。他根據祁連山下來的水渠方向，由上而下，由南而北的順序，再由北而南，如此四層，很有規則的編了三百零九洞。親筆標明號數，並考量每窟的大小、壁畫的時代與風格，編撰成「莫高山石窟記」一書。

這項工作，他率領同去的門人子弟，辛苦苦的忙了整整的五個月，由此可知此事的繁累和

艱鉅了。

第二次前往，要臨摹壁畫了，他花了兩個月

的準備時間，隨他去的人有五名喇嘛、他的兩個太太、兒子心智、姪子心德、門生劉力上、蕭建初、孫家龐，還有一個廚師、兩個佣人，帶去的食物、畫具，一共裝載七十八輛驢車。臨摹壁畫，十二丈六尺，所以要帶喇嘛去準備畫布。製作畫布，除了拼縫，還要釘在木框上，塗刷膠粉三次，勻淨之後，再用大石磨七次，才可落筆。用的顏料，如石青、硃砂、石綠等，都是由礦石提煉研磨的，每種都要數十斤，耗費金錢很多。臨摹的原則是完全一絲不苟的描，絕不能參加已意。每幅畫都要記下色彩尺寸，全部求真。

可是千佛洞內，每窟除佛龕佛臺之外，很少空隙，不能平放畫桌，祇好僱木工造架，立起臨摹。大多數洞窟光線不够，臨摹的人要一手持蠟燭，一手拿畫筆，因地制宜的有時站在梯上，有時蹲着，甚至還要躺在地上描繪。縱然是冬天，描繪不久，也會出汗氣喘，頭昏目眩。多數時日，清晨入洞，薄暮出來，有時還開夜工，大家忙得蓬頭垢面。

壁畫的顏色多已斑爛，必須手持蠟燭靜觀良久，才能依稀看出線條。張大千的主要工作，是在觀摩揣度上下功夫，往往經過幾十次的觀研之後，才能下筆。爲了不浪費顏色材料，臨摹之時，先以玻璃依原作勾出初稿，然後貼在畫布背面，在強烈的光線照射下，先以木炭勾出影子，再用墨勾，定稿之後再敷色。凡是佛像、人物主要

部份，由他自己執筆，其餘樓臺亭閣等次要部份，由他的門人子弟分繪。他不掠人之美，每幅畫都註明合作者的姓名，甚至誰人畫那一部份，也不厭求詳。由於手續繁複，極力求真；所以大幅畫需要兩個月，小幅十幾天才能完成。他在敦煌三年總共臨摹了二百七十六件壁畫，工作結束後，帶出五六十件；爲的是想到印度去核對求證其淵源爲何？並且將這些壁畫送到國內外展覽，大家才發現如此莊嚴偉麗的鉅跡，埋沒於荒漠中已將近千年了。

爲了實現他以藝術報國的遠大理想，他自籌龐大經費，排除艱難困苦，遠赴敦煌藝術寶庫，堅忍圖成的工作三年，而有豐碩的成果，並且不自矜伐；他的貢獻之大，在我國藝術史上，是很少見的。

名滿天下心存祖國

抗戰勝利後，他應邀參加聯合國文教組織在巴黎現代美術博物院的現代畫展。

民國卅八年大陸淪陷，他明知在中共的統治下，是容不下像他這樣畫家的。於是他當成都危在旦夕之時，倉皇攜帶一部份眷屬出走。決心憑繪畫爲生，雲遊四海，遍訪山川，專心作畫。次年，爲研究印度壁畫與敦煌壁畫的關係，赴印度大吉嶺居住，觀賞「阿詹塔」壁畫三個月，參驗中印筆法，認爲並不同源。

民國四十一年遷往南美阿根廷居住，次年遊巴西，在聖保羅郊外發現一大平原，地勢風貌與我國成都平原相近似，勾起他的鄉土之思。於是

，斥資平生所藏，營建「八德園」，開山鑿湖，極具中國園林之盛。於民國四十三年遷往居住，一住十七年。多年來中共看清楚張大千在我國文學界的名望地位，於是對他展開統戰、拉攏、示好、分化、威脅種種手段，從無間斷。

民國四十年他由印度回到香港之時，中共即曾策動他的姪子心一、心德二人由四川去香港，遊說他回鄉，保證給他安心繪畫的優良環境。可是他決不爲中共的甜言蜜語所動，並且痛斥「休想騙老子回去」。

後來，中共又會要他最尊敬的兄嫂張善子夫人到香港，盡量說服他「回去看看」，他雖尊嫂若母，但仍坦陳利害，堅不應允。（後來，善子夫人得友好之助，遠赴巴西和大千家人團聚。）

中共仍不死心，再派他的愛女心瑞，向他展開「回國觀光」、「舉行畫展」之類的統戰攻勢。當心瑞無法以親情打動他父親時，祇好按中共預先的計劃，要求他多寄作品回去，可以開畫展、印畫冊。他原諒心瑞的處境可憐，用心可憫；但還是嚴詞拒絕，最後硬着心腸眼見心瑞黯然離去。

民國五十九年，巴西政府要收回「八德園」，土地，他遂攜眷赴美，卜居西岸，在卡美爾經營他的新居「環翠庵」。不但羅致奇花異石，植之庵中；爲了熱愛中國，還特地種植梅花達百株之多，以行動來「殷勤說與兒孫輩，識得梅花是國魂。」爲免別人誤會他是日本人，同時表明他心向中華民國的立場，還每天在院中升起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。他一生作畫的落款，大都用甲子或

中華民國年代，而從不用西曆年期，這又充分表示他守護中華文化的完美人格。

民國六十三年，香港左派分子要訂購他幾十幅畫，他卻於每幅畫上題出「中華民國」的年代，以免被人利用來構造是非；並且還題詩明志，

兼以斥罵搞統戰的無恥之徒，詩曰：

「百本裁梅應自嗟，看花墮落倍思家；

眼中多少頑無心，不認梅花是國花。」

他在國外生活得很舒適，但他仍然心懷祖國，而於民國六十五年回來定居，當時他已七十八歲高齡了，曾經感慨的說：

「在國外我並不快樂，就像大海裡浮動的木塊，不知此身繫於何處？」

回國之初，他在臺北市雲河大廈貯屋住一段時期，一面自己擇定外雙溪地方，營建新居「摩耶精舍」，民國六十七年完成後遷入，才算真正落葉歸根。他在此安居五年，是他後半生最悠遊、最愉快，也最充實的歲月了。他曾在此賦詩云：

「山自龍慈樹自蒼，山頭山寺自齊梁；

山僧不管人間世，閒坐山樓看夕陽。」

這真是一般人所難得，也是他一生企求的神仙境界了。（下期續完）

訂閱「中外雜誌」及「時代文摘」請撥電話五三六五三